

# 论康熙朝永定河治理问题

宋开金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康熙朝是永定河发展的重要时期, 正式确立了束水攻沙的治理方案, 这是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的必然选择。对永定河的大规模治理应始于康熙三十一年。筑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不应归罪于于成龙。康熙朝治理永定河, 是根除直隶水患的一次积极尝试, 也是束水攻沙思想的实践, 使永定河道趋于固定, 并建立了完善的管理机制, 确定了河名, 但也存在忽视淀泊作用、忽视黄河与永定河土性的不同、改变北京地区水文状况等不足。

**关键词:** 康熙; 永定河; 治理

**中图分类号:** K92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444(2015)02—0009—04

清代是永定河发展的重要时期, 从康熙朝开始, 清政府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筑堤束水是清代永定河治理的基本方案。清代至今, 许多学者就永定河筑堤问题进行了探讨, 如清代的陈仪、方苞, 当代的尹钩科、吴文涛等。笔者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就永定河筑堤束水、大规模治理的时间、对于成龙的看法以及对康熙朝永定河治理的评价等问题提出一些见解。

## 一、筑堤束水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

永定河亦名浑河、无定河等, 为桑干河下游, 自石景山出山之后, “径卢沟桥, 地势陡而土性疏, 纵横荡漾, 迁徙弗常, 为害颇巨”, “于是建堤坝, 疏引河, 宣防之工亟焉”<sup>[1](P3808)</sup>。

永定河有堤防, 并非始自清代。《大清一统志》载: “左奕堤在十里, 辽时谓之西堤。又七里堤在县东八里, 辽时谓之东堤。”《畿辅安澜志》认为: “《辽史》不志河渠, 其堤防亦无可考。二堤今为哑巴、龙河二水所经。盖旧浑河故道也。”<sup>[2](P687)</sup>可见, 最晚在辽代, 浑河已有堤防。金“(明昌三年)六月, 卢沟堤决, 诏速遏塞之”<sup>[3](P143)</sup>。这是永定河决堤较早的记录。元代“(世祖至元)六年十二月戊子筑东安浑河堤”<sup>[4](P123)</sup>; 九年十月, “乙未筑浑河堤”<sup>[4](P143)</sup>。成宗大德六年春正月, “乙卯, 筑浑河堤, 长八十

里”<sup>[4](P439)</sup>。仁宗延祐二年春正月, “丙寅, 霖雨坏浑河堤堰”<sup>[4](P567)</sup>。英宗至治二年六月, “丙子, 修浑河堤”<sup>[4](P623)</sup>。泰定元年夏四月, “发兵民筑浑河堤”<sup>[4](P646)</sup>。“延祐……三年三月省议浑河决堤堰, 差官相视, 上自石径山金口, 下至武清县界旧堤”<sup>[4](P1595)</sup>。可见, 元代浑河不但频筑堤防, 且已有较大规模。明代浑河筑堤更为普遍, 冲决也屡见记载。如成祖永乐七年六月, “决固安贺家口”<sup>[5](P2137)</sup>。洪熙元年七月水决卢沟桥东狼窝口岸二百余丈。《明史》言: “桑干河……上流在西山后者, 盈涸无定, 不为害……下流在西山前者, 泛溢害稼, 畿封病之, 堤防急焉。”<sup>[5](P2137)</sup>从这一点来说, 筑堤束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清初也重视对浑河堤防的修筑。《大清会典则例》载: “顺治九年遣官修理石景山以南至卢沟桥一带决口堤岸……康熙元年, 谕八旗都统及有司官不时稽察, 嗣后堤岸决坏之处, 其田土属旗人者, 都统督旗人自行修筑; 属民者, 有司官督民自行修筑, 永定为例……七年, 题准芦沟桥堤岸冲决, 动帑修筑。又题准霸州等处堤岸冲决, 动帑修筑。”<sup>[6]</sup>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 “以河道渐次北移……用直隶巡抚郭世隆议, 疏永清东北故道, 使顺流归淀”<sup>[1](P3808)</sup>。三十七年, 清廷因保定以南诸水与浑河汇流, 水势难容, 时有泛滥, 因此命于成龙“疏筑兼施……浚河四

十五里，筑南北堤八十余里，赐名永定”<sup>[1](P3809)</sup>。这次筑河，康熙帝经过周密的筹划，并咨询了流域内百姓的意见。康熙三十七年五月，“甲戌，武清民请筑外堤。上曰：‘筑外堤恐损民田。’民曰：‘河决之害，更甚于损田。’上曰：‘水潦将降，暂立木桩护堤，开小河泄水，俟明春雨水前为尔等成之’”<sup>[1](P249)</sup>。《清实录》记载：“朕经行水灾地方，见百姓以水藻为食，朕曾尝之。百姓艰苦，朕时在念。是以命尔于雨水之前速行浚河筑堤，使田亩得耕，百姓生计得遂。”<sup>[7](P996)</sup>《永定河志》记载：“永定河……至京西宛平县境，土疏冲激，数徒善溃，颇坏田庐，为居民患。康熙三十七年，圣祖仁皇帝轸念滨河百姓图维捍御之策，特命直隶巡抚于成龙筑堤浚河，以奠民业。”<sup>[8]</sup>工程竣工后，康熙帝对于成龙说：“朕意浑河、清河，俱汇流霸州城南，原欲沿河修筑堤岸，不意至霸州询地方百姓，据云浑河原经固安县，后因迁徙，汇合清河，流至霸州。二河水势浩大，以致泛滥为灾。朕遂更初见，一从民言，于固安县开河，事乃有成。”<sup>[7](P1008)</sup>可见，筑堤束水既是大势所趋，也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是不得不为的方案。学者言及此，多有非议。如吴文涛教授认为“历史上的永定河筑堤，主要是被动防御思维的结果……缺乏针对整个流域进行综合治理的固本之策”<sup>[9](P164)</sup>，将水灾延伸到了下游地区，并导致河床淤高、沿岸湖泊湮废、地下水位下降、水质恶化等环境问题。此论虽是事实，却有些以今绳古。限于当时的工程技术水平，再加上生齿日繁等社会因素，筑堤束水是必然的选择，也收到了“无迁徙者垂四十年”的效果<sup>[1](P3809)</sup>。吴教授所言“针对整个流域进行综合治理的固本之策”在当时是难以做到的。如高斌在乾隆八年（1743年）就提出从上游筑坝治理永定河的思想，但因技术难以支撑，最终废弃。直到光绪年间王德榜军利用近代工程技术及火药的帮助，才取得成功。

## 二、清代对浑河的大规模治理的时间

一般认为，永定河的大规模筑堤始自康熙三十七年：“康熙三十七年……此两岸筑堤开河之始也。”<sup>[10]</sup>笔者认为该说法并不确切。要搞清这一问题，需要对永定河筑堤的时代背景加以梳理。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是清政权巩固在中原统治的时期。这段时期清廷主要将精力放在维护统治上，经济发展缓慢，“自康熙二十年以后……海内始有起色”<sup>[11]</sup>。确立了全国统治后，清廷才得以发展生产。康熙帝“听政以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

事，书宫中柱上”<sup>[1](P10122)</sup>。“康熙二十二年奉旨：漕运关系重大，一切定例务期久远。”<sup>[12]</sup>“河道关系漕运民生。”<sup>[13](P1828)</sup>因此，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后，清廷的主要关注点在河务与漕运上，尚未顾及浑河。

通过一个例子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康熙二十年（1681年）九月，康熙帝巡视京畿，召霸州知州吴鉴询问所受水灾、堤防决口情况。了解情况之后，康熙问：“堤不修治，民生必不得安，何不速为修治？”吴答：“修堤甚难，所费钱粮浩繁，又需民力甚多”<sup>[13](P748)</sup>。康熙听了吴鉴对为何不修堤的回答后，只是叮嘱：“知州、知县最为亲民之官，必忠勤守法，爱惜百姓，方谓称职。若贪残百姓，贻害地方，国家具有定法也。”<sup>[13](P748)</sup>，并表示通过蠲免的方式加以优抚，并未提出兴工治河。可见，当时并非治理浑河的最佳时机。

康熙三十一年，康熙帝发上谕：“浑河堤岸久未修筑，各处冲决，河道渐次北移。永清、霸州、固安、文安等处，时被水灾，为民生之忧。可详加查勘，估计工程，动正项钱粮修筑。”<sup>[14]</sup>之后，直隶巡抚郭世隆率属官“查明浑河故道在固安、永清之北，向有旧堤七十二里，今河滩移徙，每遭冲决，常罹水患。此堤之亟宜修也。又查地势北高南下，旧堤既修，北水无归，居民受患。永清东北向有旧河五十四里，年久未浚，间有淤塞成途者。欲使顺流归淀，此河之亟宜浚也”。工程一开展，“愚者殚其力，达者挚其心，胼手胝足，登登然竞趋坚峻，勿事虚糜，一望新程，宛如带砺，不越月而堤工告成”<sup>[8]</sup>。

此后，康熙屡次巡视堤工。康熙三十三年“五月……丁巳，上巡幸畿甸，阅视河堤……己未，阅化家口、黄须口、八百户口、王家甫口、筐儿港口、白驹场口，薄弱之处，咸令增修。庚申，阅桃花口、永安口、李家口、信艾口、柳滩口等处新堤。上曰：‘观新堤甚属坚固，百姓可免数年水患矣’”<sup>[1](P240)</sup>。三十四年“五月……壬申，上巡幸畿甸，阅新堤及海口运道”<sup>[1](P241)</sup>。

笔者认为，清代对浑河的大规模治理，应始于康熙三十一年。康熙帝频繁阅视，是为工程的进一步开展做准备，但对准噶尔的用兵使工程不得不搁置。康熙三十四年“命大军分三路备噶尔丹”<sup>[1](P242)</sup>。三十五年二月“上亲统六师启行”<sup>[1](P243)</sup>。三十六年二月“上亲征噶尔丹”<sup>[1](P247)</sup>。“秋七月……上巡幸塞外”。三十七年正月“上巡幸五台山……二月……戊辰，上还京”<sup>[1](P248)</sup>。亲征噶尔丹与巡幸塞外暂时搁置了对浑河的治理。而正是在回京的途中，康熙作出了浑河治理的决定：“回銮至畿南，念浑河害民田庐，即马上与公（按：于成龙）议，欲改河

渠。”<sup>[15](P151)</sup>“直隶霸州一带水灾系保定以南河水汇入浑河及浑河淤塞所致，命原任河督于成龙、王新命分别查治。”<sup>[16](P1036)</sup>三月，康熙命于成龙、王新命查勘直隶河流，指示：“尔等惟挑浚淤沙，河之两岸掘五六尺深阔，令水得畅流，当不至于涨溢矣。尔等须详视具奏。筑堤浚河工竣，设立河夫，委官监视，及时预为挑浚。遇旱岁力去淤沙，庶无水患矣。”<sup>[7](P995)</sup>此后，于成龙与西洋人安多等勘查浑河，将相关事宜绘图呈进。最终，于成龙“四月陞辞到任，随发帑三十万，命开渠改浑河，俾自固安县北直达于湖淀，至天津入海。时正炎暑，公昕夕奔驰，选才量地，克期分挑，不一月告成……天颜大喜，赐改名永定河”<sup>[15](P153)</sup>。

可见，清廷之所以在康熙三十七年才对永定河进行大规模治理，与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

### 三、关于于成龙治河

于成龙，字振甲，号如山，汉军镶黄旗人，崇德三年（1638年）生于盖州（今辽宁盖州市），康熙三十九年卒，“赐祭葬，谥襄勤”<sup>[1](P1027)</sup>。于成龙主持了康熙三十七年的浑河治理工程：“自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迳固安北十里铺、永清东南朱家庄，会东安狼城河，出霸州柳岔口三角淀，达西沽入海。”<sup>[1](P3809)</sup>清代许多官员对这一方案颇有微词。如陈仪批评道：“从来治河者，必通计全局之利害，而后可定一河之会归。必先定下流之会归，而后可议上游之开筑……东淀……畿辅全局之水，无一不毕潴于兹，以达津而赴海……自抚臣于成龙奉命开筑永定河，不为全局计，而只为一河计，遂改南流之故道，折而东行，自柳岔口注之东淀，于是淀病而全局皆病。”<sup>[17](P46)</sup>这一指责有些牵强，因为改河东北流的趋势在康熙三十一年就已经出现：“三十一年，以河道渐次北移，永清、霸州、固安、文安时被水灾，用直隶巡抚郭世隆议，疏永清东北故道，使顺流归淀。”<sup>[1](P3809)</sup>“三十七年，以保定以南诸水与浑水汇流，势不能容，时有泛滥，圣祖临视”<sup>[1](P3809)</sup>，“康熙三十七年二月谕内阁：霸州、新安等处，此数年来，水发时，浑河之水与保定府南之水常有泛涨，旗下及民人庄田皆被淹没。详询其故，盖因保定府南之河水，与浑河之水汇流于一处，势不能容，以致泛滥此二河道，着左都御史于成龙往；保定府南河，着原任总督王新命往。作何修治，令其水自分流……”<sup>[14]</sup>可见，河道北移是大势所趋，康熙之所以下决心筑堤，在于浑河南流，与保定府诸河汇聚，危害百姓田庐，而治理的方法，就是“令其水自分流”，使其不再南流。清人又抨击于成龙为了保护祖坟而使浑河改道。如

陈仪言：“于成龙……自护茔域，奏改故流而注之淀池之内，以浊流入之水，不数年间而信安、高桥、胜涝、辛张等淀，垫为平陆，骎骎乎淤黄汊，抵台头，淤壅清流。几无达津之路。”<sup>[17](P21)</sup>方苞也说：“于成龙以浑河冲半壁店，近其祖墓，奏改河道，迤东入淀。”<sup>[18]</sup>陈仪、方苞都主张永定河复归故道，这从本质上说是对康熙朝永定河治理思想的否定。但他们未敢将矛头指向康熙，而是对于成龙大加笔伐。实际上，康熙帝在永定河治理中起了绝对主导作用，他多次阅视河工，指示方略，并确立了治理思想：“上阅卢沟桥以南河工，谕王新命等曰：‘此河性本无定，溜急易淤，沙既淤，则河身垫高，必致浅隘。因此泛滥横决，沿河州县居民，常罹其灾。今欲治之，务使河身深而且狭，束水使流，藉其奔注迅下之势，则河底自然刷深，顺道安流，不致泛滥。’”<sup>[7](P1061)</sup>在具体方案上，康熙多次作出指示，如“谕原任河道总督王新命曰：‘此河当水大之时，甚是湍急。此堤断不能阻遏，必须修挑水坝始为有益。’”<sup>[7](P1061)</sup>“上至郭家务村南大堤，以豹尾枪立表于冰上，亲用仪器测验。”<sup>[7](P1061)</sup>他还满怀自信地说：“官不清则为民害，水不清亦无利于民。天下之浊者皆如此也。不清之官，朕有法以正之；不清之水，朕有策以治之。”<sup>[7](P1061)</sup>可见，在浑河治理工程中康熙起了绝对的主导作用，于成龙出于私心改河的说法很难成立。

总之，于成龙治理永定河，取得了很大成绩，“相比较同时代的治水理念和治水实践，他更善于综合、为我所用，因地制宜地提出自己的治水主张并付诸实践，取得了很多成效。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永定河水患频繁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上游水土流失加重、下游河床淤积抬高和洼淀围垦过快综合作用的结果。归根到底，是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不协调的产物”<sup>[19]</sup>。因此，过分抹煞于成龙在永定河治理中的作用是不公平的。

### 四、对康熙朝永定河治理的评价

#### （一）功绩

第一，对永定河的治理是根除直隶水患的一次积极尝试。对浑河的治理，是自金元以来的一大难题，历朝均曾筑堤浚河，但并未试图以大气力根治水患。康熙二十二年后，清廷开始着手解决全国水患问题。对于浑河，康熙帝非常重视，“吾想畿内不能防，何况远治淮与黄”<sup>[14]</sup>，展现了这位“千古一帝”的决心与信心，是康熙试图根除直隶水患的一次积极尝试。

第二，束水攻沙思想的实践。金元以来对浑河的治理，并未从治河思想上作出阐释，只是就决口言

堵筑,就漫溢言堤防。清人继承明代万恭、潘季驯提出的“束水攻沙”思想,对黄河、运河展开了治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黄河是“经行山间,不能为大患。一出龙门,至荥阳以东,地皆平衍,惟赖堤防为限”<sup>[1](P3715)</sup>,而浑河是“汇边外诸水,挟泥沙建瓴而下,重峦夹峙,故鲜溃决。至京西四十里石景山而南,过卢沟桥,地势陡而土性疏,纵横荡漾,迁徙弗常,为害颇巨”<sup>[1](P3808)</sup>。堤防形势的相类及含沙量大的特点,使清代对浑河的治理亦是采用“束水攻沙”思想。从历史与现实来说,筑堤束水是必然选择。康熙朝正式采用束水攻沙治理永定河,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第三,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随着永定河治理工程的开展,永定河堤防管理制度也初步建立。在大堤防护方面,确立了修守事宜,如对凌汛的防御,各汛员“于惊蛰前五日移驻要工,并委试用人员及武弁协防”<sup>[14]</sup>,并预备防汛物料。对麦汛的防御,要求“凡疏浚中泓、挑挖引河等工程,俱在枯河时赶办,限麦汛前报完验收。夏至前五日或后五日,麦黄水必至。水头一到,石景山厅差人驰报。南北岸、厅率同各汛员随水查看”<sup>[14]</sup>。此外,还继承潘季驯的主张,规定“四防”(昼防、夜防、风防、雨防)、“二守”(官守、民守)、“五事宜”(报水、预估工程、采备料物、积土、种柳)等。在职官方面,康熙三十七年设立总河,又设南北岸两分公司、南北岸八汛、南北岸千总、南北岸把总;四十三年设南岸同知、北岸同知等,初步建立了永定河管理制度。

第四,河道的固定。吴文涛教授认为:“康熙三十七年以后修筑的堤防将永定河从中下游直至入海口紧紧约束起来,从而彻底改变了石景山以下河道在平原地区摇摆不定的水文特性,这是永定河环境演变史上的巨大转折。”永定河筑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生齿日繁使得永定河下游河道不能再自由摆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河道的固定是一种进步,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体现。

第五,河名的确定。永定河在康熙三十七年以前,有浑河、无定河、卢沟河、桑干河、小黄河等名称,三十七年以后,才有了永定河的名称,沿用至今。名称的确定或多或少地对永定河水利事宜的记载、研究带来了一定便利。当然,“浑河”的称呼并未消失。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一些老人仍称永定河为“浑河”,这也许是并未永定的永定河留给流域内民众的历史记忆吧。

## (二)不足

第一,忽视了淀泊对洪水的翕受作用。永定河入东淀,是康熙朝永定河治理的一大败笔。对此,清

人已有论及。如陈仪指出永定河入东淀,“于是淀病而全局皆病,即永定一河,亦自不胜其病”<sup>[17](P46)</sup>。淀泊对洪水具有突出的翕受作用,汛期可容纳洪水,减轻水患。而永定河含沙量较大,一旦入淀,“淀为定水,无冲刷之力,故沙入而沉”,造成淀泊淤垫,降低了翕受作用。因此,永定河入东淀,是康熙朝永定河治理的最大缺陷。

第二,忽视了永定河与黄河的不同。康熙朝对永定河的治理,主要参照治黄的思想。从水性上说,两河均含沙量大,善淤善决。但就流域内土性来说,两者又有很大不同。黄河虽然有淤垫问题,但“两岸多系埽工,土性坚实,可以加高培厚”。而永定河流经之处则土性疏松,以沙为主,“水势湍悍,斗折蛇行,而土性沙松,堤防未可深恃”<sup>[14]</sup>,“出山之水湍急异常,变迁无定,动辄挖根漫顶,如水浸盐,遇极盛涨时,堤防断不足恃”<sup>[20]</sup>。这一点,康熙帝没有注意到,在筑堤伊始,河身淤垫尚少,堤防的压力并不突出。而一旦河身淤垫,土性疏松造成堤防不足恃的问题就显现出来。

第三,改变了北京城的水文状况。吴文涛教授认为,永定河筑堤对北京水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使石景山以下河道趋于固定,加剧了永定河故道水体的湮废和水源的短缺,带来地下水补给的困难,引起地下水水质恶化,加剧了下游的环境灾害<sup>[21]</sup>。笔者虽认为永定河筑堤是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的必然选择,但从客观上来说,吴教授的观点是言之有据、毋庸置疑的。

## 参考文献:

- [1] 赵尔巽. 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 王履泰. 畿辅安澜志[M]. 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 [3] 脱脱. 金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4] 宋濂.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 [5]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6] 大清会典则例[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7] 清实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8] 陈琮. 永定河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9] 吴文涛. 北京水利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 [10] 佚名. 直隶五大河流图说[M]. 清抄本.
- [11] 贺长龄. 清经世文编[M]. 清光绪十二年思补楼重校本.
- [12] 杨锡绂. 漕运则例纂[M]. 清乾隆刻本.
-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康熙起居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4] 李逢亨. 永定河志[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 [15] 宋荦,李树德. 于襄勤公(成龙)年谱[M]//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辑.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下转第27页)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5]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 [M]. 陈嘉映,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董红克)

# **On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of Mind**

ZHANG Tan

( Party Committee Office , Bengbu Medical College , Bengbu233030 , China )

**Abstract:** Descartes is the founder of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of mind. Aristotle understood the soul from the view of quality and buried a foreshadowing for Descartes' Dualism of body and mind. Descartes put forward modern concept of soul by thinking body and mind as two different entities. The concept of soul is enlightening but difficult to make out a good case. The same times of Descartes, British empiricists thought of feeling as the nature of the soul, and the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ers argued that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mind were rational and intentionality. The two have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Descartes' soul theory.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mind; descartes; british soul; german soul

(上接第 12 页)

- [16] 章开沅. 清通鉴·圣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七年 [M]. 长沙:岳麓书社, 2000.
  - [17] 陈仪. 陈学士文集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 [18] 方苞. 望溪集 [M]. 清咸丰元年戴钧衡刻本.
  - [19] 陶桂荣. 于成龙与永定河治理. 山西水利 [J]. 2009 (5).

- [20] 万青黎、周家楣,等.光绪顺天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21] 吴文涛.清代永定河筑堤对北京水环境的影响[J].北京社会科学,2008(1).

(责任编辑:刘 明)

## Discussion on the Yongding River Governance in the Kangxi Period

SONG Kaijin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Kangxi Dynasty is an important period of development of the Yongding River. Then formally established the treatment scheme of sand flushing. This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alistic need. The extensive management of the Yongding River should be started in the thirty – one years of Kangxi. A series of problems caused by the embankment should not blame Yu Chenglong. Kangxi management of Yongding river is the eradication of floods in Zhili a positive attempt, also is the practice of the water beam attack sand thought. It makes Yongding River becomes fixed, establish a sound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confirm the name of this river. However, there are also ignored the lakes, ignore the the different between Yellow River and Yongding river, change the hydrological condition in Beijing area etc.

**Key words:** Kangxi, the Yongding River, government